

论朝鲜古代假传体文学对中国古代假传体文学的接受

王 群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滥觞于韩愈《毛颖传》的假传体文学传入朝鲜后,被朝鲜文学广泛接纳与充分吸收。这种接纳与吸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中国古代假传体文学叙事方法、结构的借用;其次,对中国古代假传体文学所传之物和描写方法的因袭;最后,对中国古代假传体文学“春秋笔法”的借鉴。但它并不是对中国假传体文学的一味模拟,而是借鉴中国假传体文学来影射朝鲜自身的社会现实,表现朝鲜作者自身的情感。朝鲜假传体文学上承朝鲜古代汉文小说《新罗殊异传》,下启李氏朝鲜汉文小说,在朝鲜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键词:朝鲜假传体文学;中国假传体文学;叙事结构;描写方法;春秋笔法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3-0066-06

不论从历史实践还是从文化渊源上看,中朝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文化与文学交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固然存在着双向流动,但长期以来朝鲜都是从本身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以真挚诚恳的态度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从而促进本国文学的发展,而发轫于中国兴盛于朝鲜的假传体文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假传之名最早见于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自汉司马迁做《史记》,创为‘列传’之体以记一人之始终,而后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之作传以传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1]49}并且将传记分为史传、家传、托传和假传四大类。《文体明辨序说》“假传”收录《毛颖传》和《清和先生传》两篇作品,其中唐代韩愈所作的《毛颖传》则是“假传”的滥觞,它一经出世就受到了许多人的指责,柳宗元为之辩护,才引起了假传创作的热潮并历经宋、元、明、清而不绝。假传体文学在作品的内容上,主要以器物作为描写的对象,如毛笔、墨、纸、梅花、菊花、竹子、酒等;在表现手法上,融人物传记、拟人、用典、夸张、谐音等方法为一体;在写作目的上,主要借假传或寄托社会思想,或赞赏某种品质,或揭露黑

暗的社会现实。

据相关研究者统计,从唐代韩愈作《毛颖传》一直到清代约产生300多篇传记作品,而仅在明代就创作了200多篇,形成了一次假传文学创作的高潮。但这类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始终处于边缘地位,长久以来并未能引起文人的重视,而传入朝鲜后,却受到了朝鲜文人的极大追捧和喜爱,对朝鲜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股热潮一直从高丽中后期持续到朝鲜末期,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极为成熟的写作方法和素养,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中国假传体文学的影响。对于这种现象的研究,以往研究者往往只着眼对中国假传体文学的借鉴,而忽视了假传体文学在朝鲜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对此后寓言小说的影响。因此,本文拟在小说文本的基础上充分论述朝鲜假传体文学对中国假传体文学的借鉴,并进一步阐释其在朝鲜文学史上所起到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一、“一人一代记”——史传式叙事结构的借用

朝鲜古代假传体文学作品,在叙事方式和结构上与以《毛颖传》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假传体文学极为相似。

收稿日期:2019-10-21

作者简介:王群(1991—),女,山东淄博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首先,从文章的命名上来看,中国的假传体文学作品命名方式都是将“传主与传”相结合从而构成作品的题目,如《毛颖传》《乌先生传》《竹夫人传》《金瓶传》《平凉夫人传》《管城侯传》《梅先生传》《叶公传》《虞美人传》等。由于这种命名方式简单清晰,形象生动,可以让读者一目了然地知道所传之物,因此这种方式被朝鲜古代假传体作家所借用,如朝鲜假传体《鼠大州传》《兔公传》《兔先生传》《乌圆传》《郭索传》《花王传》《抱节君传》《竹尊者传》《竹夫人传》《却老先生传》《孔方传》《楮生传》《冰道者传》等。

其次,采用史传人物纪传体“一人一代记”的创作模式。中国古代纪传体作品的写作模式是由司马迁的《史记》所开创,通常先交代传主的基本信息如姓名、字号、籍贯、祖先的事迹,然后对传主具有代表性的事迹进行详细描述,最后以“太史公曰”的方式对人物和事件作出全面的较客观的评价。中国古代叙述文学是从史传中获取营养发展而来的,假传作为叙事文学的一种也必然受到人物纪传体叙事方法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作品一开头就运用拟人化的手法,通过模仿史传写人的笔法,把物品当作人来看待,作品开头就介绍了人物的籍贯、字号、家室等基本信息,给予读者一种真实感。如:

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性麦氏,既破,随母罗氏去其夫而适石氏,因冒其姓。^{[2]411}(《温陶君传》)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于渭上,往往散居南山中,后见灭于匠氏。^{[3]120}(《竹夫人传》)

毛元锐字文锋,宣城人。(缺)于东墅而生昴宿,一名旄头,遂姓毛氏。^{[4]849}(《管城侯传》)

在介绍完传主的基本信息之后,接着介绍传主的主要生平经历和事迹,大多数作品都是从传主的历代祖先开始讲述。如《梅先生传》对于梅伯、梅福事迹的描写,《竹夫人传》中对于竹子祖先智的描写,或赞美其高尚的道德品质,或讽刺黑暗的社会现实。还有一部分作品没有描写传主祖先或后代的事迹,仅仅通过对传主自身主要事迹的介绍来表现作者的社会理想或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和态度。如《叶嘉传》主要叙述了叶嘉由于独特的才能得到皇帝的钟爱,但由于苦谏,被皇帝所疏远,后来在皇帝危难之时,献出计策才又得到了

皇帝的重新赏识,最后子孙兴旺,受到世人的敬仰。在对传主的描写过程中,传主的性格、才能都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出来。

在朝鲜古代假传体文学作品中,这种纪传体的写作模式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如:

王姓姚,名黄,系出洛阳,丰肌秀色,光华灼灼,真富贵相也。^{[5]107}(《花王传》)

尊者姓萧,讳洒然,字此君,长沙之祖,玉泉之弟,其父母乡贯,莫得而详。^{[5]112}(《竹尊者传》)

竹夫人姓竹名凭,渭滨人篲之女也,系出于苍葛氏。^{[5]117}(《竹夫人传》)

在介绍完主人公的基本信息以后,或介绍传主祖先的丰伟事迹,或直接介绍主人公的生平事迹,从而表现作者或是对某种道德的向往,或是对某种高洁品格的追慕,或是对统治阶级的讽谏,或是展现某种人生际遇。如《抱节君传》先叙述竹的祖先篁清洁的品质、传播人口的名声,再描写了主人公抱节君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在多灾多难的政治斗争面前矢志不渝的高尚品质。《楮生传》在作品开头没有对楮生的祖先进行介绍,而是直接介绍了楮生的基本信息,“生姓楮,名白,字无玷,会稽人也”^{[5]135}。紧接着叙述了纸荣辱沉浮的一生,纸先是喜欢和毛学士来往,因而天文地理等都一清二楚,可以统帅万字君。此外,它掌管记账,由于账目清楚分明,因而颇受到人们的赞誉。贞观之治时,与楮遂良等人立下汗马功劳,到宋代,帮助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王安石当政时遭到了贬黜,到了元代,楮生荒废了本职在市井里游转,到了明代又重受欢迎。《楮生传》表面上是叙述传主纸一生的贡献,但实际上展现了文人宦海沉浮的人生。《丁侍者传》通过丁侍者与释息影庵的对话,介绍了丁侍者的基本信息:他的母亲是女娲,父亲是伏羲,降生树林中后被父母抛弃,后来受到风雨的养育后才得以茁壮成长。接着开始介绍丁侍者的经历,丁侍者的职责是充当别人的侍从,但是还没有发现有资格使用他的人,于是到处流浪。按照上天的指引,丁侍者来到释息影庵处,让他接纳自己,但释息影庵觉得自己连与丁侍者交朋友的资格都没有,更不敢使用他,于是释息影庵又向丁侍者推荐了花山里的高僧。作者借丁侍者的形象抒发了对社会现实的愤懑不平。

最后,在文章的末尾附有作者的论赞,或从传

主的生平遭遇,或从传主的道德品质,或从传主的社会贡献,总结传主的本质特点以及对社会和自身带来的影响,文章立意也更加鲜明。不论是中国古代假传体小说还是朝鲜古代假传体小说,这种篇末论赞的形式都主要受到了中国历史著作叙事方式的影响。面对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史官在叙述时能够站在事件和人物之外对其作出较为客观理性的评价。这种方式在中国古代假传体小说中随处可见,如《武刚君传》中:“观其为人明利果敢,不凝滞于物,劲正之气毅然见于色,其亦锻炼淬砺之力欤。卒能佐汉以兴,传国数百载,可谓盛矣!”^{[6]253} 赞扬了武刚君明利果敢的高尚品质以及对能辅佐汉王朝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清和先生传》篇末写到:“誉之者美逾其实,毁之者恶溢其真”,“未有至公之论也”^{[7]171},作者对酒的优缺点作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不是一味地看到其优点或缺点。反观朝鲜古代假传体文学,“太史公式”的评价在文章传尾中也随处可见,《鼠大州传》篇末写到:“大抵,鼠大州以奸言流说巧倭主倖,有罪而免罪,貶南州拙直无辩,无罪而当罪,主倖之听讼,岂不误哉?盖听讼之难如此,为官者,可不察欤!”^{[5]16} 对鼠大州的奸言流说、貶南州的拙直无辩分别作出了公正判断,利用他们对为官者作出警告。《郭索传》中:“太史公曰:‘郭索,佳公子也,刚外而黄中,其学易者耶!观其披坚执锐,稟然有横草之气,而卒死于草泽。悲夫,世或以无肠讥索,岂不过也!’”^{[5]189} 肯定了郭索披坚执锐、横草之气的风格,指出它受到的待遇之不公平。《抱节君传》中:“使臣曰:‘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臣,君之谓也。既全其节,又爱其爵,流芳万叶,不予草木同凋,可谓烈丈夫矣。树此不拔之业,清白遗子孙,世封此君当与天地俱存,所谓千载香名,长不泯者也’”^{[5]111}。《竹夫人传》中:“史氏曰:‘竹氏之先,有大功于上世,其苗裔皆有才抗节,见称于世,夫人之贤宜矣。噫!既配君子,为人所倚,而卒无嗣,天道无知岂虚字哉!’”^{[5]118} 两篇分别高度肯定了竹子清白的高尚品质和竹子对社会作出的贡献。

假传运用拟人的手法,借鉴史传的文体样式,将物当做人来写,通过记载传主的生平、家世、籍贯以及主要事迹来表现传主的特点以及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意蕴。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假传,将严肃庄重的史传体和虚构怪诞的杂传体融合在一起,一方面对所传物品进行真实细致的描

绘,总结其较为全面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在描写传主事迹时杂以虚诞怪妄之说,丰富传记的内容,形成亦庄亦谐的叙事风格,在幽默诙谐的字里行间寄托作者的创作主旨。”^{[8]5}

二、“崇儒重文”——对传主和描写方法的因袭

中国古代假传体文学从唐代韩愈创作《毛颖传》开始一直到明清时期,传主的范围是不断扩大的。唐代假传体文学作品数量相对较少,传主的选择也主要集中于笔、墨、纸、砚等,但到宋代随着假传体文学作品数量增加,传主的选择范围也迅速扩大且更加贴近现实日常生活。根据有关研究者的统计,宋代假传文学作品总共有46篇。“以文房四宝作为作传对象的,如苏轼的《万石罗君传》(歙砚)、洪驹父的《陶泓传》(砚)、李洪的《石碣传》(砚)、周必大的《即墨侯传》(墨)。有以草药作为作传对象的,如苏轼《杜处士传》(杜仲)、苏轼的《甘国老传》(杜仲)、王质的《玉女传》(益母草)。有将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生活用品作为写作对象的,如杨万里《敬侏儒传》(短灯檠)、陈造《无长叟传》(短灯檠)、李觉《竹颖传》(竹)……甚至连人们日常的餐桌上可见到的事物也成了写作的对象,如苏轼《陶温君传》(面)、苏轼《黄吉陆甘传》(柑橘)、杨万里《豆卢子柔传》(豆腐)……此外,作为文人用来彰显品行的梅花和菊花也成为作者笔下的写作对象……更令人惊奇的是钱易的《乌衣传》,这篇传记发挥自己大胆想象,开始将写作的触角伸向了动物类”^{[8]5}。到了元代,作者把地理类(灵石)和乐器类(胡琴、玉箫)纳入传主范围,根据相关研究者的统计,唐宋元三代的传主大约40种。到明清时期,传主范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明清两代至少有作者122人,设计题材163种”^{[8]42},传主的类型可以分为“植物类(约18篇)、动物类(约38篇)、器用类(约122篇)、饮食类(约17篇)、人体器官类(约5篇)、天象地理类(约9篇)、抽象事物类(约3篇)这七个门类”^{[8]76}。

反观朝鲜古代假传体文学传主的选择,没有超出中国古代假传体传主的范围,动物类的传主有《鼠大州传》(老鼠)、《兔先生传》(兔子)、《乌圆传》(猫)、《清江使者玄夫传》(乌龟)、《郭索传》(螃蟹)等;植物类的传主有《花王传》(花)、《抱节君传》(竹)、《竹尊者传》(竹)、《竹夫人传》

(竹)等;事物类的传主有《鞠先生传》(酒)、《女容国传》(铜镜、手巾、面粉、蜡油、镊子、钗子、篦子等)、《却老先生传》(镊子)、《酒肆丈人传》(酒)、《丁侍者传》(拐杖)、《冰道者传》(冰)、《孔方传》(钱)、《楮生传》(纸)、《鞠醇传》(酒)、《冰壶先生传》(冰壶)等;人体器官类有《心史》(心)、《天君实录》(心)、《天君演义》(心)、《南灵传》(心)等,其中竹、酒、冰、纸、冰壶、乌龟等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儒家审美内涵。

中国古代假传体文学作品对传主的刻画十分生动形象。以唐代韩愈的《毛颖传》为例,作者运用拟人的手法,对毛颖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的描绘十分贴切生动:“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莫不纂录。……又随善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后遂见废弃,终默不泄。”^{[9]63}毛颖作为一支毛笔,不管正直之人还是邪恶小人都可以使用它,性格十分的随和,即使最终被人们废弃不用,也能保持沉默,坚守自己的内心。乍一看来极为夸张,但这些特征都十分贴合毛笔的特点。在正面描写毛笔的同时也从侧面通过其朋友来进一步展现毛笔的性格特征:“颖与降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楮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谐。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上未尝怪焉。”^{[9]63}在古代,“笔、墨、纸、砚”被称为“文房四宝”,四件物品不可分割,通过侧面的渲染,进一步展现了毛笔随和的性格特点。作品还以独特的方式实实在在地写出了毛笔的制作过程,“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号约管城子,日见亲宠任事。”^{[9]63}

在对传主的描写方法上,朝鲜古代假传体文学与中国古代假传体文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不能不说得益于中国古代假传体文学的影响。如《冰道者传》中作者在刻画冰的形象时写道:“通身莹若琉璃,气质硬如铁石”^{[5]131},与冰坚硬、通透的特点十分贴切;而“洁志律身,面目阴冷,凛然不可犯”则凸显了冰坚韧、冰清玉洁、高洁、不为世俗所污的性格和品质。《竹夫人传》中对竹夫人描写道:“总角有贞淑婆,邻有宜男者,作淫词挑之。夫人女曰:‘男女虽殊,其抱节一也,一为人所折,岂可复立于世?’”^{[5]117}通过竹夫人被男子作淫词挑之这件事情,以及竹夫人对此事做出的反应,展现出了竹夫人气节刚直、贞洁自守、任何人也不能侵犯的高贵品质。“既长。松大夫以

礼聘之,父母曰:‘松公,君子人也,其雅操与吾家相伴。’遂妻之。夫人性日益坚厚,或临事分辨,疾捷若迎刃而解。”^{[5]117}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松是文人士大夫笔下的常见之物,松在文人笔下是傲岸坚强、卓然独立的代表,通过与竹夫人婚配,从侧面更展示出了竹夫人坚贞、刚直的性格品质。《楮生传》描写的是楮生宦海沉浮的一生,虽然一生历经沉沉浮浮,但“性本精洁,不喜武人,乐于文士游,中山毛学士其契友也,每狎之,虽点污其面,不拭也”^{[5]135}。“学而通天地阴阳之理,达圣贤生命之源,以至诸子百家之书,异端寂灭之教,无不记识,征之斑斑可见”^{[5]135},写出了纸的功用与学识渊博的特征。

三、“微言大义”——“春秋笔法”手法的借鉴

中国历来十分重视史学文化,修史被人们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事情,史书最基本的编纂原则之一是追求“述而不作,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但受儒家教化至上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史书还承担了“劝善惩恶”的教化功用。这一思想滥觞于孔子《论语》的“兴观群怨”说,此后便形成一股迅猛之势,影响到了各种文学题材。如在诗歌创作中“此亦有助于风教也”^{[10]10};论作词有:“极思属词,得不动关于教化”^{[11]142};论作戏曲有:“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12]111}。在史传著作中则表现为孔子在编创《春秋》时所使用的“春秋笔法”,这种笔法的主要特点是一字置褒贬,在“微言大义”的点评中通过字句或修辞方法的使用来表现儒家匡正世风,垂范礼仪的社会理想。通过表面上的“微言”来追求深层次的“大义”,这种手法在史传创作的过程中十分普遍,而假传体则表现出鲜明的“拟史”倾向,因此在假传体文学作品中“春秋笔法”的手法表现得尤为突出。

朝鲜受中国的影响,也十分注重史文化,如12世纪,高丽以宋朝的史官制度作为参照,设置了官修实录,而且与中国相似,史官的社会地位非常高。到了李氏朝鲜,官方对修史更为重视,朝廷专门设置了修史的官员,记载的内容也无所不包。不可否认中国史传所运用的“春秋笔法”对朝鲜古代假传体文学作品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

朝鲜古代假传体文学出现在高丽中后期。一方面,王建执政后,在政治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在大力扶植佛教的同时又大力劝奖儒学。

光宗年间(950—975),在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下模仿唐朝开始实施科举制度,学习汉文化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普及。到了成宗年间(982—987),高丽更加崇尚文治,积极开办学校甚至派遣留学生到宋朝学习。但在另一方面,高丽也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从993年开始,高丽不断受到来自契丹的入侵,其后的70多年时间里,处于宋、辽、金三国之间复杂的关系之中。在面临外患的同时,高丽内部也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武臣政变事件。武人夺取政权以后,高丽人民内部受武臣们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外受金国的威胁,而文人则备受迫害和压制。到了元宗(1259—1274),高丽王朝在元朝的威胁下,屈膝投降,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风气极端混乱不堪。对当时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封建文人来说,既要抒发自己愤慨,表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道德品质追求,又要避免受到迫害和牵连,“春秋笔法”受到文人学士的喜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孔方传》中,传主是被拟人化的铜钱,文章主要讲述了金钱对人生活和道德消极影响的一面。作者在传尾的评论中写道:“为人臣而怀二心,以邀大利者,可谓忠乎?方遭法遇主,聚精会神,以握手丁宁之契,横受不赀之宠,当与利除害,以报恩遇,而助溥擅权,乃树私党,非忠臣无境外之交者也。方设其徒,复用于炎宋,阿附执政,反陷正人,虽修短之理,在于冥冥,若元帝纳贡之言,一旦尽诛,则可以灭后患也。而旨如裁抑,使流弊于后世,岂先事而言者,当患于不见信乎?”^{[5]135}这不仅鲜明地表现出了作者对金钱的否定态度,更表现了作者不愿与武臣跋扈的污浊的社会环境相妥协的情怀,具有警示世人的意义。《清江使者玄夫传》讲述的是:“玄夫作为隐居清江的学识渊博的文人,甚至国王想任用他,也在清江里自得其乐,恃才傲物而绝不入世,但因被人捉住而不得已入世后,反而备受达官贵人们的尊崇。然而,入世并不全是春风得意、一帆风顺,而是时时刻刻都面对着危险和杀机。不情愿地入世后,玄夫的儿子被人所擒,不得善终。”^{[5]158}此篇是作者李奎报在武臣夺政后黑暗的历史时期心路历程的反映。面对污浊的社会环境,作者在入世与出世这两条道路的选择上表现出了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矛盾、犹豫、彷徨的心态,而玄夫则是对以作者为代表的广大知识分子的隐喻。纵观朝鲜古代假传体文学,作者在创作中对“春秋笔法”的运用清晰可

感。面对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作者只能借此笔法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志向和对某种社会理想的追求。

起源于中国的假传体文学在唐传奇和宋话本的影响下没有得到文人的应有重视,传入朝鲜后却在朝鲜古小说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上承朝鲜古代《新罗殊异传》,下启李朝汉文小说,对后世朝鲜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假传体文学发展到后期,出现了一批具有寓言性质的小说,这些小说具有鲜明的“拟史传性”的特征,故事情节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篇幅的长度相比之前的假传体文学更为宏大,它们常常以历史上国家的兴亡,朝代的更替为创作素材。故事情节也较为模式化,一般开始是国君励精图治,但由于沉溺于声色犬马,诱发内忧外患;成功解决矛盾后,君主最终幡然悔悟,改过自新。在叙事的过程中往往涉及到大量的君臣关系、君妃关系,以及忠臣与奸臣、妃子之间的矛盾斗争,代表性的作品有《花王》《花王戒》《女容国传》《愁城志》《心史》《天君实录》《天君演义》等。以《女容国传》为代表,作者把女子的妆容拟人为孝庄皇帝,其臣子则是各类梳妆用具,如用镜子拟人化为丞相、用朱铅拟人化为太傅、洗水拟人化为水军都督、面粉拟人化为安抚使、蜡油拟人化为都指挥使、篦子拟人化为后将军等。这些作品本质上都是通过对历史素材的摹写来对统治阶级进行劝惩教化。以《天君实录》为代表的心性小说,在继承高丽假传体文学传统的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代明清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它们虽然在篇幅、结构等方面与假传体相比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就其本质来说,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大量的文学素材,同时也大大丰富了文学创作的表现技巧和方法。

假传体文学作为朝鲜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受到自身文学传统的长期孕育外,中国古代假传体文学对其产生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含有儒家文化元素传主的继承、生动贴切的文学性描写、“一人一代记”式的纪传体叙事结构、“微言大义”式的创作技巧等,使假传体文学成为朝鲜古代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但它并不是对中国假传体文学的一味模拟,而是借鉴中国假传体文学来影射朝鲜自身的社会现实,表现朝鲜作者自身的情感,并对后世的文学在文学素材、表现方

法和技巧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朝鲜假传体文学对中国古代假传体文学的借鉴,体现出中国文学对朝鲜文学的深刻影响和朝鲜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广泛接受与充分吸收。

参考文献:

- [1] 吴讷,徐师曾. 文章辨体序说[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2]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第 91 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3]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第 128 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4] 董诰. 全唐文:第 801 卷[M]. 影印嘉庆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林明德. 韩国汉文小说全集[M]. 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

[6]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第 172 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7]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第 120 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8] 俞樟华,姜欣星. 古代假传和类传研究[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9] 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 唐宋八大家散文大典[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

[10] 萧统. 陶渊明集序[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11] 吴融. 祥月集序[M]// 郑奠,谭全基. 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2] 高明. 琵琶记[M]// 王季思.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 济南:齐鲁书社,1991.

On Ancient Korean False Biography Literature's Accepting Ancient Chinese False Biography Literature

WANG Qun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false biography literature of Han Yu's *Maoying Biography* is accepted and absorbed by Korean literature,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borrowing the narrative methods and structures, following the used objects and descriptive methods, and drawing on the Chunqiu writing method. However, it doesn't simulate Chinese false biography literature blindly, but uses Chinese false biography literature to allude to the Korean social reality and expresses the Korean authors' emotions. Korean false biography literature connects the Korean ancient Chinese novel, *Xinluo Unusual Biography* with the Lee's Korean Chinese novels, and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Korean literature development history.

Key words: Korean false biography literature; Chinese false biography literature; narrative structure; descriptive method; Chunqiu writing method

(责任编辑 梅 孜)